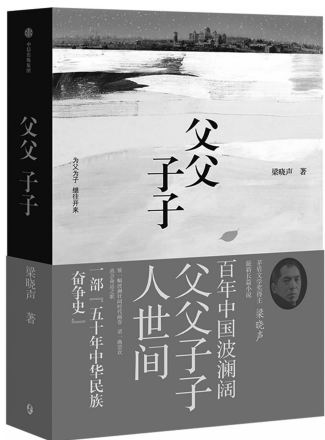


壮阔历史画卷映射的家国大义

□禾刀



2022年12月
中信出版集团
梁晓声
《父子》

从1930年代写到上世纪80年代，从东北白山黑水写到美国唐人街，从“九一八”写到抗战再写到抗美援朝，写到北大荒……随着阅读的深入，就像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慢慢舒展，贯穿五十年、跨越四个家族四代人的故事跃然纸上。

与前不久狠狠刷了一回屏的《人世间》倾注寻常百姓日常烟火气息不尽相同，《父子》

中东北高氏、孙氏、赵氏，以及纽约赵氏四个家庭四代人跨越半个多世纪悲欢离合的背后，始终有一个大写的“家”，即国家。而投射在这个大“家”上面的，则是四个家族同仇敌忾、无以割舍的民族大义。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故事时间跨度半个多世纪，前后涉及四代人，没有一个角色贯穿始终，家族传承才是这个故事叙述的重点。四个家族中，高家分量更重，几乎经历了各个重大历史事件。早年高家深耕东北特别是哈尔滨，“九一八”后日军侵占东北三省，高家面对淫威没有妥协，而是放弃不切实际的实业救国梦想，一面巧妙地与日军周旋，一面支持地下工作。正是高家的这团熊熊燃烧的火焰，孙赵两家亦深受感染，前仆后继地投入到抗战一线。

抗日战争的烽火同样烧到了海外华人的心上。唐人街青年赵世杰原本有一个音乐梦想，得知民族危亡消息后，放下进入百老汇的难得机会，毅然参加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最后以身殉“国”。这里的国之所以打上引号，是因为赵世杰对自己的身份一度颇为困惑：“我们唐人街出生的青年，若说自己是中国人，其实已经不是了。若说自己是美国人，美国又不待见我们。”不过，身份的困惑并未能

成为投身抗日大义的障碍。赵世杰参加飞虎队有两次“瞒”，一次是瞒着家人私下报名参军，另一次是瞒着家人提前启程，前一次瞒是民族大义驱动使然，后一次瞒则是因为不忍目睹离别的悲伤。

相较于父亲高鹏举在国内的“土生土长”，高坤从小在唐人街长大，回到国内的高坤似乎缺乏充足的思想准备，当挫折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时一度失忆，之后前往苏联才医好这一创伤。高坤的失忆更像是他思想的一次重构，而前往苏联又像是他精神的一次重塑。自此以后，他的信仰才更加坚定，这也为他日后在面对新挫折时不屈不挠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而支撑高坤重新站起来的，恰恰是民族大义这一精神支柱。

民族危亡面前，有人挺身而出，有人怨天尤人。对此，梁晓声借赵家之口指出，“中国人不全是阿Q，阿Q哪个国家都有。要讲什么劣根性，也是全人类至今多少都有的现象。”在梁晓声看来，唤醒阿Q虽然必然，但这并不构成个体舍弃民族大义的先决条件。反倒是，当更多的人为了民族大义舍生忘死时，可能惊醒那些麻木不仁者。

在谈到这部作品的创作初衷时，梁晓声说：“中国之近代的史，不唯苦难，不唯悲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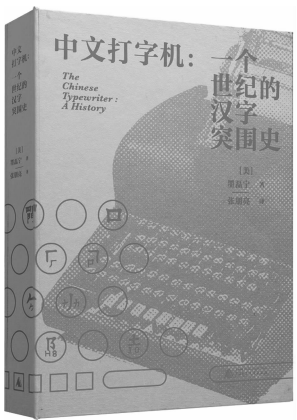
亦有大气节大义勇在焉！”“以往一谈到中国历史，更多的是苦难、悲情。但是我觉得不唯有苦难，不唯有悲情，还有那么多大义大勇的人物在历史中出现过。”在梁晓声的笔下，大义大勇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无论是面对日寇还是反动势力，抑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样的特殊时期，胸怀大义大勇的人总能汇聚一股股势不可挡的力量，披荆斩棘，破浪前行。

许多细节极耐人寻味。在写到庆祝二战胜利时，唐人街的游行队伍出现了这样一幕，“没有欢呼，没有口号，没有笑脸——鼓声敲得震天响，引舞人和彩狮相互默默地舞，大人默默地行，孩子们默默地跟……”“默默”二字将人们的复杂心态展现得淋漓尽致，虽然华人们替胜利感到高兴，但许多华人家庭也因此失去了亲人。在过往作品叙事中，虽然不乏对华人以种种方式参战的描述，但鲜有作品能够深入华人的心理世界，毕竟每一个鲜活生命的背后，都有一个焦灼不安的家庭。

故事最后，高鹏举的妻子赵淑兰回到国内安度晚年，而历经劫难的高坤也重新找到了伴侣，这样的结局似乎迎合了圆满的叙事传统，又似乎预示着大义在这个家族架起了新的链接。

中文打字机与中国现代化

□林頔



2023年1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美]墨磊宁
《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墨磊宁(Thomas S. Mullaney)的研究方向是近代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在《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里，墨磊宁追溯了从晚清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文打字机发明、行化的一段历史，揭示了技术语言学背后深层次的政治文化根源，以及两种异质文明的冲撞与这种冲撞所引发的关于现代性的思考。

墨磊宁没有简单地把问题归结为“语言帝国主义”。在他看来，这一问题并不涉及某种特定语言的支配性或霸权地位，不同于通常在现代的某些殖民地语言政策中看到的情况，即把一种支配性语言强加给一个从属性群体。墨磊宁认为，相比帝国主义语言的霸权体系，更重要的二元对立表现在：一边是形式多样、为众多的虚义文字，一边是形单影只，却覆盖广袤地域、跨越漫长历史的实义文字——中文。

以欧美为中心的语言霸权体系曾经试图将西方和非西方的各种文字统统纳入其权力结构，而中文以其独特的语言形式游离在这一权力结构之外。为了避免这种尴尬，西方以漫画等嘲讽手段表现“嗒记”这种想象中的、集结了成千上万个按键的、巨大的中文打字机在技术上的荒谬感，暗示着中文只有字母化才能被纳入全球化的语言信息秩序，包括鲁迅、陈独秀在内的一批民国学人当初就出于这种设想而激进地要求汉字字母化，西方学者比如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则批评中文书写的本质“从一开始就是对科学发展的一大障碍”。

这是一场对汉字冷酷无情的、全方位的围剿，这是从技术语言层面排斥中文的行为。若

想打破这种包围，只做政治文化的思考和呼吁，是远远不够的。技术，必须依靠技术，才是最有力的武器。所以，《中文打字机》的核心是一段技术文明的历史，突破“雷明顿”体系的包围，批判性地重新解读中文书写本身的要素，创建真正符合汉字解构、搜索和检索的信息处理系统，用事实证明：技术从来不是壁垒，制造壁垒的从来都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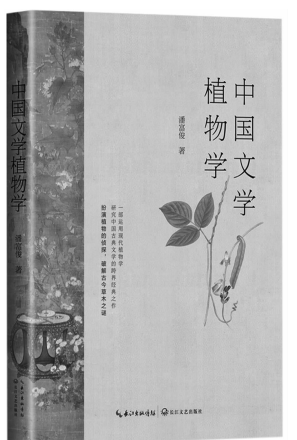
这部作品讲述了百年来各种中文打字机的发明过程，包括常用字检索、字体设计、部首顺序、活字印刷等相关技术。法国汉学家包铁夫的“拼合活字”汉字拆解法；汉学家李格昂编写的214部首表；传教士谢卫楼与第一台中文打字机；中国留美学生周厚坤和他基于3000个常用汉字而设计的中文打字机；祁喧和他的拼合式打字机，其特点是用尽可能少的元素来呈现构型多样的中国文字，还有舒震东、俞斌祺等人的发明……中文打字机被证明是现实可行的，商务印书馆专门成立了中文打字部门来研发这项技术并投入实际使用，“女打字员”成为新兴的一项女性职业。中文打字机的研发与市场开发，也一直夹杂着与雷明顿打字机、日文打字机等较量的较量，帝国霸权仍是题中之意。

林语堂与明快中文打字机，尤其值得一提。林语堂为了这项发明投入大量时间和人力物力，欠下巨债。很可惜，明快打字机没有获得投入商业量产的机会，但它确实是现代中文信息技术史上的一项重大突破，它是一种全新的人机交互的例证，标志着“输入”的诞生，而“输入”的核心意义指向未来互联网时代的技术语言环境。明快打字机的重大意义，可能连林语堂本人都没有意识到。在钱锺桥撰写的《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里，林语堂是这么说的：“我期望中文打字机的发明能够为中国办公商务的现代化扮演重要角色，使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工业时代。”至少，这一点，在本书的后半部分逐渐得到了实现。

《中文打字机》一书，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国名排序问题作为引子，指出国际奥委会规则中所谓“按照主办国语言的字母顺序”这一理念的伪普适性。这是全书的基调。这部作品是技术文明史，但是，作者时刻提醒读者，所有的技术支撑都建立于文化理念之上。关于中文打字机的历史书写，墨磊宁的计划是两部作品，另外一部将“通往中文计算机历史与输入时代”，讲述20世纪下半叶和我们所置身的这个时代，中文在技术语言方面的突破。

植物与文学的深厚情缘

□甘武进



2022年10月
长江文艺出版社
潘富俊
《中国文学植物学》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在《古诗十九首》中的《青青河畔草》里，柳树是诗词吟诵最多的植物，早在汉代之前，就代表着悲怆和忧愁，这首诗中的柳就带着浓浓的离愁。事实上，历代诗词歌赋、章回

小说的内容，大都有植物的描写。有些以植物启兴，有些以植物取喻，更多的是直接对植物的吟诵。换句话说，各类文学的内容总离不开植物。翻开《中国文学植物学》这本书，我们走进植物的世界，感受植物与文学的深厚情缘。

作者潘富俊是著名景观植物学教授，多年来从事文献研究与田野考察，本书是他的代表作。这是一部运用现代植物学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跨界经典之作，扮演植物的侦探，破解古今草木之谜，内容几乎囊括了植物与文学这一主题的方方面面——文学作品中植物名称的辨析与古今演变，植物的文学意境，国画中表达画家情意趣的植物，礼仪植物及文学植物引进史……可以说是作者近半个世纪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现，既有理论的支撑，也不乏文学的审美趣味。

《诗经》是中国最古老的诗歌集，其记述动植物种类繁多，因此古人说读《诗经》可以“多识草木虫鱼之名”。以植物而言，《诗经》中记载了许多与古人生活相关的作物，有些词句已成为今日的常用语，如桃之夭夭、萱草忘忧等，可印证《诗经》对中国文学和民众生活的影响力。在《诗经》305首诗中，有一半的篇章内容提到

或描述植物。《周南·关雎》：“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句中的“荇菜”，即现今的荇菜；《郑风·东门之墀》：“东门之栗，有践家室。”栗即板栗。

《楚辞》各篇章出现的植物共九十九种(类)，寄寓意志的植物特别多，以“香草、香草”比喻忠贞、贤良，而以“恶木、恶草”数落奸佞小人。《七谏·怨思》“江离弃于穷巷兮，蒺藜蔓乎东厢”句，“江离”是香草，对应恶草“蒺藜”。江离今名川芎，是重要的香料植物和药材。在古代，只有道德高尚的君子，才有资格佩兰。《楚辞》中共有18章30句提到“兰”，单是《离骚》一章就有7句以“兰”为香草。在屈原的作品中，常以香草喻君子，而香草中又以“兰”出现频率最高。

自古诗、书、画合一，古典文学和国画之间有时并无明显的界限。书中说，国画的植物种类虽然历代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都和文学作品《诗经》《楚辞》及历代诗词歌赋有关，每个朝代呈现的画作植物种类也均比前代有所增加。国画用以表彰气节及寄寓心志的植物，主要以松、柏、竹、菊、棘等植物为多。松、柏岁寒不凋，喻君子在艰苦环境仍屹立不摇；竹则“心虚有节”，象征君子的谦虚美德及清高的志节；棘就

是酸枣，木材粉红色，谓之“赤心”，喻忠贞的心志。

用植物器官的色彩来创造文学用词，而为后人所师法者，实例很多。此类语词来自植物的花、叶、果实的颜色，如花红柳绿、红桃绿柳、橘红橙黄等，适当应用在文句上，常能创作新颖切题的诗篇。明代刘基的《春思》：“忆昔东风入芳草，柳绿花红看总好。”元好问的《洞仙歌》：“千崖滴翠，正秋高时候，橘红橙黄又重九。”元代白朴的散曲《双调·沉醉东风》：“黄芦岸白蘋渡口，绿柳堤红蓼滩头。”短短两句就出现黄、白、绿、红四个颜色四种植物，曲中充满艳丽色彩。

落红不是无情物，一花一叶总关情。潘教授潜入中国古典文学的汪洋里，科学地爬梳各色植物的来龙去脉、古今演变、特性意象等，虽然少了个人化的抒怀感想，却以系统地研究搭起文学与自然科学的桥梁，挽起文学与植物二者之间传唱千古的隽永关系，让我们得以换一种视角打量草木生灵，了解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了解独属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四季轮转，我们不要忽略植物的开落荣枯，学会珍惜，感受生活的芬芳和诗意。